

□ 本报记者 张瑞雪 金芮宏 赵浩然

大众观察

“柳老师捐献了肝脏、肾脏、肺脏及一对眼角膜，为4名器官衰竭的患者带来希望，为2名失明的患者带来光明。”山东省立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郭继业说。

4月4日上午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（山东省立医院），34岁的柳广庆兑现了自己于去年4月许下的承诺：在一场长达2个多小时的手术后，他的多个器官被立即送至其他病榻，至少6个挣扎在病痛中的患者，将仰仗他的慷慨，有望重新触摸生命的美好。

手术开始前，所有医生向蓝色床单上平静躺卧的柳广庆遗体，深深弯腰，鞠了一躬又一躬。

这并非告别，而是严肃的求解。面对死亡这一无可逃避的课题，柳广庆给出郑重回答：共生与延续，是他为生命找到的另一种可能。

手术室外，家人痛哭，瘫坐在地，相互搀扶间仍不停地呼喊着“不要走，我不要你走”。

即便正被巨大的悲伤碾过，但他们仍然愿意成全柳广庆去“伟大”一次——没有一个人提出反悔。

截至目前，全国累计有65万余人，与柳广庆写下了同样的生命解法。



生命终点，向世界“送礼物”的人

34岁的生命，与6个人一起“活着”

“我弟弟其实还没死，因为这些用他器官的人，还想着他；用他角膜的人，还带他继续看世界。”

“最终能否顺利捐出器官，往往不取决于个人意愿，更多地取决于你的家人。”

当患者被判定为脑死亡时，竭力说服捐献者家属，为苦苦等候移植的患者争取新生的机会，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“沟通工程”。由此诞生了专门从事此类工作的人群，他们被称为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”。

这一角色显然常常遭遇误解和怒气，但又如此必要。今年一项研究显示，我国潜在器官捐献者的转化率仅为25.3%，低于欧美国家54%的转化率。

换言之，生前登记了捐献意愿的人，只有约四分之一能成功捐出“生的机会”。而多数人，正是卡在了亲这一关。

根据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《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》，捐献须遵循自愿、无偿的原则；其配偶、成年子女、父母等亲属拥有对捐献的“一票否决权”。只要一个人喊停，捐献即告终止。

正因如此，破除刻板成见、耐心讲

解政策条例的协调员，是连接生与死的重要桥梁。若能让亲属感知机制的公平与透明，执行逝者的意志将会顺畅得多。

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柳广庆在去世前一年就独自登记了捐献意愿，且是多个器官同时捐出，但柳广庆的父母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同意了捐献，这在长辈中并不多见。

“这孩子心特别细，生前就很善良，愿意帮助别人。他自己有这个想法，我们就遂了他这个心愿。”柳广庆的姐夫告诉记者，一家人对柳广庆的决定，一致开明地选择支持。

柳广庆生前在济南市长清区工作，常年与姐姐一家共同生活。相较于其他泣不成声的家人，姐夫并未显露出激动的情绪，仅在走廊空荡时，偷抹了一把眼泪。

姐夫说：“我弟弟其实还没死，因为这些用他器官的人，还想着他；用他角膜的人，还带他继续看世界。”

对许多家庭来说，“捐献者将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和延续生命”的信念，往往是其点头同意的关键。于柳广庆而言，2个小时的手术后，他将在6个陌生人的身体里继续跳动、呼吸、观看这个世界。

“换心”新生后，一家三代的“回礼”

“咱是受益的人，只能效仿人家的做法，也去捐献，有用的全捐出去。”

若生命报之以最珍贵的礼物，如何才能回馈它？

十年前成功“换心”的徐凯这样回答：妈妈、弟弟、女儿，包括他自己，一家三代都已经登记遗体（角膜）捐献意愿，“我们太懂那种等待的滋味了。”

“咱是受益的人，只能效仿人家的做法，也去捐献，有用的全捐出去。”徐凯说。

2016年，扩张型心肌病让徐凯躺进

了北京的急救诊室，“一口气上不来，就那一两分钟，人可能就憋没了。”

危急之际，只剩一个解决方案：“换心”。唯有移植一个新的心脏，才能换取生的可能，尽管家人被告知，新器官存活率仅有50%。

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有二三十万人，在生死边缘等一个可移植、能适配的器官。其中，只有约2万人能顺利手术。换句话说，就算想换，也未必有合适的心源，同病房有人等了足足半年。

徐凯是幸运儿中格外幸运的一个。8天的评估检查后，徐凯的全面数据被上传到全国统一、唯一的匹配系统：中国人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（COTRS）。

同年6月，系统综合紧急度、匹配度、地域、

血型等因素评分后，短短几个小时，一个合适的心源就出现了。“我在北京的旅馆里，跑到后院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。”

徐凯母亲回想那一刻，仍面露激动。

手术后，徐凯被顺利转入无菌病房，并无并发症。当天恰好是他的生日，徐凯直感叹：“我真觉得那天自己是重生了，心里很感激。”

毕竟，在他这台成功的手术背后，还有10双望穿的眼睛。

这颗陌生人捐献的心脏，也宛如祝贺，它曾经的跳动得十分有力。徐凯觉得，它曾经的主人一定很年轻。

“你得爱惜它，好好保养，不是换上了就万事大吉了。”移植并非一劳永逸，术后因疏于维护而离世的人不在少数，毕竟与非自体的器官相处并非易事。

尽管每天仍需定时服用抗排斥药物，提醒着徐凯，这仍是一颗“外来的”器官。但是，三千多个日夜的共处，徐凯越来越觉得：这颗心脏过去的主人，好像始终和他一起，为生的喜悦，一刻不停地有力跃动着。

徐凯甚至给自己改了网名，叫“心心相印”——“两颗心，一颗大的套着一颗小的，挺贴切”。

2017年6月24日，风和日丽的一天，徐凯一家祖孙三代签下了遗体捐献志愿书。

爱出者爱返，这是他们为有爱

者献上的“回礼”。



石碑上的红与金：那些永不凋零的名字

“每个名字背后，肯定都有一个让人想流泪的故事。”

山青青，满目新绿，春风拂动。专为遗体捐献者修建的山东省暨济南市遗体捐献纪念馆广场正中，矗立着一座遗体捐献纪念碑，方正肃穆。两侧，陈列着大大小小的大理石碑。

碑身之上，密密麻麻、长长短短、五颜六色的，是名字。这是捐献者因留下了身体的某一部分，而得以留下的名字。

清秀苍劲的文字镌刻在石碑上，有的列出了捐献者的姓名、出生与捐献日期。徐凯俯身，手指掠过一排排名字，又停在一处：这个名字的出生日期与捐献日期，竟是同一天。

他不禁唏嘘，“每个名字背后，肯定都有一个让人想流泪的故事。”

身为济南市红十字遗体（角膜）捐献志愿服务队的一员，徐凯对其中一些名字颇为熟悉，对这些故事，他娓娓道来。

比如，在遗体捐献石碑上，不同于满目鎏金碑文，有少数名字是特殊的红色，且只显示出生日期。“这通常是一对夫妻。”徐凯解释说，一方先离世，名字被描金；另一方尚在人世，但也选择把名字留下，先涂红，待到真正捐献后再变换颜色。

凝神细看，有些红色名字已经褪去了大半颜色。这表明，在伴侣离世后，他们已独自走过漫长岁月，却始终守着这个严肃的承诺，等待履约一刻。

碑文中色泽最鲜亮的一个，捐献日期停留在今年3月16日——生命的热切馈赠，从未停止。

还有人特意用绒布做了菊花，紧紧贴在捐献者名字一侧。因为相比鲜花，它更不易凋零。

“一般来说，一块墓碑前，祭拜的不过三代人。”徐凯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说给碑中人听，“但把名字留在这里，会有无数素不相识的人为你献花，这难道不更值得吗？”

临走时，徐凯向着石头上静静陈列的名字，深深鞠了一躬。

图①：4月4日，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（山东省立医院），医生和济南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术前向柳广庆遗体鞠躬。（□记者 张瑞雪报道）

图②：近日，在山东省暨济南市遗体捐献纪念馆广场，徐凯向遗体捐献石碑鞠躬。（□记者 张瑞雪报道）

图③：2017年6月24日，徐凯签下遗体捐献志愿书。（□受访者供图）

□ 盖颐帆

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、推进工作的重要手段，但实际工作中存在一种开“预制会”的现象，只顾“打磨”会议，忽视其实际价值。

所谓“预制会”，就是流程提前“码”好、发言提前“定”好、结论提前“对”好的会议。“预制会”现象，表面看是会议问题，根子却出在政绩观偏差。

当前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，为人民出实绩、以实干出政绩。这场学习教育，正是要校准那些偏离了“实”字的观念与行为。

“预制会”背后，是“虚”与“实”的错位。

开会为了什么？为了统一思想、研究问题、推动落实。但“预制会”的逻辑恰恰相反：追求的是“开过会”的显示度，而非“解难题”的含金量；关注的是“怎么说”的流程规范，而非“怎么做”的实际成效。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下“空中命令”，要求当天报送数据材料，追求“上午刚刚栽树、下午就能乘凉”，下级只能造些材料来应付过关。

实效从何而来？从直面问题的勇气中来，从解决矛盾的硬招中来。当年红旗渠的建设者，“宁愿苦干，不愿苦熬”。今天如果满足于“预制会”上的表态，用“熬”的心态消磨时光，如何啃得下改革攻坚的硬骨头？

“预制会”背后，是“全”与“专”的混淆。

有的地方开会，追求流程完整、环节齐备，却忘记了会议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。当“我简单讲三点”成为会议标配，当纸面成效被等同于工作实绩，看似高效全面的程式，实则是把复杂问题强行塞入简单的预制框架，用结构完整来掩盖思考不足。

因地制宜，本质上是实事求是。用“预制”的套路来应对千差万别的现实，无异于刻舟求剑。会场上多一分即时问答，落实时就少一分盲人摸象；会前少一点预设答案，会后就能多一点精准施策。

“预制会”背后，是“显”与“潜”的失衡。

“预制会”为什么盛行？一个重要原因是“免责”心态在作祟：程序走到了，记录记全了，态度表过了，责任就撇清了。至于问题没解决，那是落实环节的事。这种心态，本质上追求的是“显绩”——看得见的程序规范、听得到的表态发言，却忽视了“潜绩”——需要下苦功、费长力才能解决的深层矛盾。

正确的政绩观，要求既做显功、也做潜功。一场会开得好不好，真正的评价标准，从来不在会议的流程有多规范、话讲得有多漂亮，而在群众舒展的眉头与发自内心的掌声中。如果只重“显”不重“潜”，只重“形”不重“效”，就会陷入“以会议落实会议”的循环空转。

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不妨从少开“预制会”做起。少一些预制的表演，多一些现场的实践；把会场搬到一线，把决策落到实地，把评判交给群众。唯有如此，方能让每一次会议都成为解决问题的起点，而不是形式主义的终点。

干部二字，“干”字当头。不干，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。不负时代，不负人民，靠的不是会开得多漂亮，而是事干得多实在。

（上接第一版）为什么会这样？答案藏在两对矛盾里。

第一对矛盾：水价与成本的错位。以工业用水价格为例，16市一般工业水价平均4.6元/立方米，水费支出占企业成本比重低，企业节水改造的动力不足。

第二对矛盾：公益与市场的撕裂。节水项目投资大、回报慢，社会资本凭什么进场？正如山东省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彭学军所言：“节水产业发展潜力大，前景广阔，但在推进机制、市场培育等方面还存在不足。”

放眼全国，类似困境并不罕见。缺水地区同样面临“企业想节水却算不过来账”的难题。

而在以色列，正是通过水价全成本回收、水权交易市场化、技术研发补贴等组合政策，才让节水从“政府吆喝”变成“企业抢着做”的生意。

从“政策托举”到“市场内生”

在莱芜，区属国企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自主研发“节水灌溉装备产业大脑”，将分散的企业数据整合起来，构建起产业治理、协同创新、数智转型、综合服务的产业生态，并于2025年入选山东省“产业大脑”建设试点，目前已与区内50余家企业深度合作。

省级层面，山东先后出台节水产业发展规划和实施意见，从投资补助、技术推广、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支持。金融活水也在精准滴灌，截至2025年底，全省“节水贷”贷款余额54.2亿元，同比增长85.1%。

这些探索正在从不同维度破题。但要真正解开节水产业的“结”，仅靠政府端发力远远不够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曾指出：“节水是一把钥匙，能够同时打开三把锁——水资源短缺、水环境污染和水生态损害。”而这把钥匙能否真正转动，关键不在政府手中，而在市场里。

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，节水不只是响应号召，更是一条看得见、算得清的增收节支路径时，产业的内生动力才会真正被激发。未来的关键，不在于还能挤出多少水，而在于能否建立起让市场信号引导企业主动节水的长效机制。

一滴水，折射绿色发展的底色，也映照着山东向新而行的探索。节水产业的突围之路，山东已经启程。而这条路能走多远，答案不在文件中，而在市场里。

（上接第一版）“以前一家人种不到十亩地，还得起早贪黑；现在一个人管几千亩，反而有了富余时间。”多光谱摄像头将麦苗分蘖转为数据流，地下传感器每隔半小时传回土壤“脉象”。

受去年秋汛影响，山东小麦普遍晚播，苗情偏弱。金丰家庭农场里，一场“促弱转壮”攻坚战正在展开。“晚播了二十天到一个月。”刘杰说，播期推迟导致分蘖量少，管理思路随之调整——一类苗稳控，二类苗适度追肥，三类苗前移肥水节点，重点“扶一把”。

在利津县北宋镇，种粮大户马玉松对无人效率赞不绝口。“1小时搞定200亩，施肥喷药又快又匀。现在种地不光靠力气，更靠科技。”

在河口区新户镇，“农技服务百日行动”正在开展。农技人员分片包联、进村入户，手把手教农户科学运筹肥水。农户王伟感慨：“以前施肥凭老经验，今年农技人员讲得清清楚楚，心里踏实了。”

从“会种田”到“慧种田”，智能监测，无人机飞防、水肥一体化等正在让传统农事更加精准高效。正如刘杰所说：“晚种不等于减产，关键环节抓住，基础就能稳住。”

这个春天，科技与汗水交织而成的盐碱地治理“山东方案”，奏响了黄河口的“春之声”。